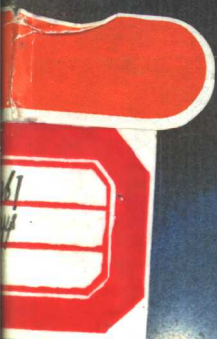


华夏出版社

三色魂

周嘉堤



135867

1267
7744

北京·1992年华夏出版社

著
三色魂

(京)新登字045号

三色魂

周嘉堤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西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75印张 73千字 插页3

1992年4月北京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册

ISBN7—80053—333—6/K·054

定价:2.00元



作者近照

象征悲哀和死亡的黑色
也代表钢铁和泥土
欢愉又炽热绚丽的红色
是万物奋争的脚步
蓝色中伏着黑色的生命
博大、深沉而质朴

人，一旦失去眼睛，黑暗就将他紧紧包裹、压迫。没有光的生命，充满了悲哀和痛楚。

十年浩劫，使我失去了一双明眸！当时，我正值豆蔻年华。

路漫漫呵……

每一步都要摸索而行，能够感觉到的只有脚下坑洼的路。各种各样的幻觉在眼前跃动。缤纷的时而恐怖时而美妙的色彩在脚下扑朔迷离。

每走一步我都是那样的胆战心惊。我知道，一旦倒下，没有眼睛的生命也将彻底结束了。而我并不甘于如此。

在广漠的荒原，在凋枯的山野，在冰雪覆盖的峡谷深涧中，我怒吼，我呐喊，我寻求着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内涵。

我的感情需要发泄，我的追求渴盼理解。当我的爱与憎需要表达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折磨中，我发现了天和地用它的灵气赋予人类的第二个太阳。

这太阳是诗。

她在茫茫夜色中升起，使我在黑暗的重压下获得了冰雪融化的快慰，使我在黑暗的窒息中呼吸了清新舒爽的空气。我的生命又充满了阳光。

从此，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文学林海中艰难跋涉，掬饮着文学清澈的溪水，我撒开了心灵的网……

终于，我捧起一首首从心中涌出的诗，呈现给太阳！



还是念中等师范一年级时。一天，下了晚自习我回到学生宿舍。几缕昏黄的光从门缝透出，我推门一看，同屋姓张的同学正在蜡烛旁捧读《普希金诗选》，桌上还放着拜伦、雪莱的诗集。我问：“你怎么不到教室去看书？”“静静的夏夜透过朦胧的烛光读诗，能使人消魂。”我觉得滑稽，信手翻开这三本诗集，目光落在普希金、拜伦、雪莱的肖像上。他们都很俊美，洋溢着天才的神采。然而，他们的诗我却不想读，既无故事，又无情节。

我对新诗看法的迥变是在偶然之中。一天，我去卫校同一位朋友话别。她不在，她的哥哥友好地接待了我。我坐在布置得雅致、书卷气很浓的房间里，望着右侧一排书柜出神。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若干世界名著。出于礼貌，主要是因为拘谨，我没有去碰那些书。拿起桌上的一册中学语文课本，信手翻到郭沫若的新诗《天上的街市》。

读完，我合卷沉思，惊叹这首诗的绝妙与优美。我发现诗是超越时空的艺术，是小说、散文的升华，蕴蓄了人间丰富的情。我发现，过去对诗的偏见有多么愚蠢，竟没产生过爱的冲动。我的枕边只堆放着巴尔扎克、鲁迅、茅盾的书。

我与诗联姻是在我失明之后。

1968年初春的一天，二弟给我带来一首残疾军人写的诗。他读给我听。诗中那充满自信与活力的诗句，令我激动。我的心灵被震撼了：勇敢地活下去，活得有意义一些！我告诫着自己。

困难只能在软弱者面前存在却挡不住久经锻炼的士兵……

清晨和深夜我都在朗诵，在默默地思索。

失明导致了我身心和性格的巨大变化。我从好动到只能安稳地坐着或者躺着，我的情绪在黑暗中经历了痛苦的熬煎，我似乎显得沉静成熟了。这时，诗悄悄成了我的好友。诗的字数不多，对于我来说，学写诗要比学写小说来得方便，我有充足的时间思索，孕育，推敲；我满腔的情怀需要抒发，诗不就是表达我感情的最佳形式？我爱上了诗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说：“在一切艺术中最集中、最完美、最高尚的乃是诗。”的确，诗是简单的，却也是复杂的；诗是真诚的，因而也是最美的。我渐渐发现，写诗不仅要有敏锐的思想，独特的艺术感觉和荡漾胸怀的激情，还必须有扎实的语言功底。

我暗下决心，一定在基本功上花力气。

隔壁院子李家有一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代诗歌选》，小弟将书借了来。每晚我都要用滚开的放有生姜、辣

椒的淘米水的蒸气熏脚；水温适度时，再浸泡双脚，据说这样能治眼睛。利用这段时间，小弟念诗给我听，那时小弟才11岁。书上对难认的字标有拼音，每首诗还有注释和讲解。小弟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，反复几次，一首诗就背熟了。一年之后，我竟能熟背三百余首古诗词了。

二楼住着春生一家。春生是我家常客，那年头学校停课，年轻人无所事事，我们常聊至深夜，谈得最多的就是诗。从春生那里借来《艾青诗选》、《红柳集》等书，我把其中最喜欢的诗如《乞丐》、《贝壳》等，背得滚瓜烂熟。

寂寞时，我把背得的诗篇高声朗诵，或在心头默念，有如捧书翻阅，同样能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。我的许多日子被寂寞占有，这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在不断温故中揣摩、领悟诗情、诗意、诗歌艺术表现的奥妙和隐喻、暗示、象征等手法的艺术规律。

我掌握的词汇少得可怜，后悔失明前没有把《新华字典》背熟，记牢。为了补救，我只能利用一切学习机会，从友人的龙门阵中，甚至从路人的对话里，寻找、获取我的所需。这种学习方法，直到今天我还在用。

我的第一首诗写在1968年5月。这天，弟弟从河边摘来了两朵栀子花，那沁人肺腑的浓郁芳香，那深印在我脑海中洁白如玉的甜柔形象，唤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——端阳，粽子，龙船……。

在山脚的溪水旁，我们和老师伫立在风雨之中，凄清的

风抚弄着我们的短发和发辫，使我们触发了怀古的情思。恍惚间，汨罗江畔一位披发执剑的伟大诗人形象飘然而至。君王的昏庸使他肝肠寸断，山河的破碎使他痛心疾首，他仰天长啸，跳入滚滚的江水……我们把纸折的小船轻轻投入溪流，一艘又一艘纸船在风雨中飘摇，在水浪中打转，终于有一艘小船飞快地跃过溪水，带着我们的情思，带着我们的悼念，飘向远方的汨罗江……

记得，1967年7月，我去上海医治眼疾，列车驶过汨罗江时风雨交加，从车窗向外眺望，我这被黑布蒙住眼的人只看见黑茫茫的世界。“生命的路啊，你在哪里？”我在心底呼喊。一个炸雷在天空震响，低沉而又坚定的声音在苍穹萦绕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我的心、我的精神震颤了，想到了投江的屈原，想到了跳湖的老舍，也想到了我自己的眼睛。悲愤的泪水溢满了我深陷的眼眶。“我要用心灵的辐射去探索人生。”我默默地深思。

我把栀子花紧贴着脸颊。河边的栀子花呵，莫不是屈原投江时溅起的水珠？突然，心中萌起了写诗的冲动。栀子花在葱茏枝叶的托擎下，有的仰望天空，有的俯视大地。我又联想起艾青在《透明的夜》中的诗句：夜可以透明，蓝天也可以透明的……

于是，诗的精灵第一次在我脑海里涌动——

你仰望透明的蓝天
是在怀念投江的诗人？

你低伏古老的土地
是在寻觅诗人的足迹？
你是诗人溅起的水花
任凭多少次黄沙蔽日风满天
依然洁白芬芳
你这比白云还白的花呵
唤起人们多少心酸的追忆
 血与火的战场
 咆哮的汨罗江……
你这比白云还白的花呵
显示着诗人不屈的性格
 点缀了中华河山
 燃烧了世代悼念

渐渐的我的习作多起来，有模仿《草木篇》而作的《花之曲》，有以初恋为素材的《落花》……

这些习作有如荒山上瘦弱的灌木丛中晶莹透亮的红果子，在炎炎烈日下闪烁，在暴雨闪电中等待，盼着有一天能与世界亲近。

亲近是何等艰难！那时节，没有文学杂志，没有文艺副刊，写作也是冒入狱下牢之险。小弟把我的习作抄在一个硬壳练习簿里。我把练习簿藏在枕头里面，提防着一旦有破门而入的抄家者，便把本子挪到窗外。在刻苦学习和提心吊胆中，我盼着自己的习作能变成铅字，盼着能听到读者的反响。

然而这是一个缥缈的梦。

1972年夏，凋零的文艺开始还阳，出现了两三家文艺副刊和极少的文学刊物。我也开始了投稿。每天早晨10点，我伏在阁楼的窗台上，尖起耳朵期等着邮递员单车的铃声。每当听到铃声，心总是狂跳不止，然而每一次的铃声都是从耳边飞过，邮递员始终没有呼唤我的名字。

一位亲戚来家闲聊，谈起他的一位朋友也在写诗投稿。我问：“发表没有？”答：“没有，得过退稿单。”我听了，从心底涌起几多羡慕，我连退稿单是横写、竖写还都不知道呢！哪怕只摸摸编辑部的信封也好啊。

一天，二弟下班回来告诉我，他在路上碰到一位姓丁的熟人。丁说：“你家哥的诗在《广西文艺》发表了。”二弟表示怀疑。丁说：“稿纸连邮票也没贴，被退到了王家。王家把稿子念给大家听，算发表了。”我坐在独凳上，夕阳火辣辣地烤着我的脸，汗水从发根大颗大颗浸出，顺着脸颊滚落。耳边轰鸣着嘲笑的语言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蛋，乌鸦还想混进白天鹅的队伍里。”我狠狠地撕拽着自己的头发，心在喷血，喷着愤怒的岩浆。许久，我回到自己的阁楼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连环营寨盘石坚，雨断前路征人烦，轻击皮鼓马长啸，何日金刀斩娄兰。”

习作不能发表原因何在？我苦思苦想，开始怀疑自己不是写诗的料子了。

盛夏的傍晚，文鹏兄顺路来我家小坐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颇为满意的两首诗念给他听，静候他的判决。文

鹏兄不知我的心事，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听完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你能写诗，而且能写出好诗来。《鲁迅铜像前》中有些句子很有味道。”几句话犹如一支强心针，使我重又振作起来。文鹏兄还指出了我的作品的缺欠：作文气过重。

我的兴趣转移到了民歌上，整天专心琢磨，写出了“迎红桥，喜洋洋，湘江河水桥下唱”一类的顺口快板，“大水牛力气大，犁田犁了一大坝”之类的儿谣。然而，这些习作的命运如何？我仍是连退稿单也未曾摸过。

庆鹰了解我的苦闷，他把我的三首习作推荐给了省刊诗歌编辑陈佩云老师。几天后，涂尘野老师来到遵义。我向他谈了烦恼。涂老师微笑着说：“行，把你觉得满意的诗抄几首给我带回去。”

陈佩云老师的书案上有了庆鹰和涂老师推荐的相同的三首诗。这位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文科的女编辑，被我的遭遇和诗作打动了，选定《鲁迅铜像前》一首待发。然而，发表作品还须有作者所在单位的证明信。

那时候我休学在家，属于无所依托的小小游民，只好求助于街道居委会。老太婆们的心肠是好的，但一听说是要在报上发表作品，此乃非同小可的事情，就变得严肃起来，慎重起来。经过研究，答复是：发表在黑板报上可以，要登报、登刊物是不行的。

万般无奈只好铤而走险。二弟哭丧着脸去找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婆，谎称民政部门要给我一点救济，请求居委会盖个章。居委会主任透过老花镜掂量良久，才在一份残疾证明上

盖了图章。然后，二弟又在上边加了一句：“周嘉堤历史清白，作品同意发表。”

我们为自己的狡黠得意，又为不得不这样做而哭泣。当这张同意我发表作品的单位证明送到编辑部时，《鲁迅铜像前》已经通过终审，因为涂尘野老师在编辑部当众宣布：“周嘉堤的政审由我担保。”

我发表第一首诗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节日。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恍如一切都发生在昨夜；然而却已度过了十三个年头。

二弟媳提着一大篮子洗干净的衣服上楼来：“大哥，《贵州文艺》寄来的！”我接过来一摸，是个沉甸甸的牛皮纸长信封。一定是我的诗发表了！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怦怦跳动，身体仿佛飘了起来，飘向那铺满点点白花的原野，几多感慨顿时涌至心间。寄出去上百首诗，付出了八年的努力，总算有了这令人快乐、陶醉的一天——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。

“目录上没有你的名字……”二弟含着不安的声音，好似一盆冰水泼来，从我的头上直淋到脚跟。“发了！发了！在24页。”霎时，冰消雪溶，我仿佛又置身在那开着点点小白花的原野上。“念给我听听，快！”二弟念了一遍，一个字都没改。值得庆贺的成功使人不能安宁、平静。我们几兄弟出门穿过两条巷子，爬上郁郁苍苍的后山。山林中显得格外幽静，偶间，只有几声鸟鸣。我想：“林子里的红鸟、白鸟、蓝鸟众多，还有红伞般的青岗蘑菇、细长的鸡脚香菇，恬静的兰花在阴凉

湿润的角落悄悄开放……如果不走入林中，谁会知道它们的存在？谁又会知道它们存在的形态和神韵呢？”我的生活，我周围的人们的生活，就像这山林，就像这山林中的鸟、香菇、兰花。人心若要相通就得理解，理解首先就要了解；或许就是这种愿望和情绪的驱使，文学才得以应运而生。

夜晚我靠在阁楼的小床上，手指在《贵州文艺》上划来划去，犹如在梳理一只鸟儿美丽的羽毛，感到一种充实的愉快。有了第一首，就会有第二首、第一百首，我坚信。我把《贵州文艺》小心地放在枕下，很快进入梦乡。梦境中，我的第一本诗集问世了，摆放在书店的柜台里，像山林中的一朵花，朝读者恬静地笑着，像林中的一株树，呈现出勃勃生机……

二

据说不少报刊的文艺版面只发表以“和走资派斗争”为题材的作品了，我又陷入新的苦闷之中。我不能为了发表，去昧良心地写。然而，光阴不能付水流，我总该继续握住诗笔，不能让生命中刚刚出现的太阳消失了！我想起一位老先生曾给我讲过的太平天国翼王率兵路经遵义的故事。翼王曾站立凤凰山，眺望遵义城，出于军事占领的必要性和代价的考虑，翼王令兵绕城而过，兵抵云南昭通分三路入川……

事也凑巧，二弟从破旧书中翻出一本1961年的学术月刊，其中有篇文章提到，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着一张来自黔北的

翼王募兵文告。这说明翼王率天兵路经遵义决非杜撰。我想，何不写一部以太平天国革命为背景，颂扬起义军将士的叙事诗？我萌动了这样的念头，并为这个念头的出现而惊喜。

在仁怀插队的同学告诉我，茅台一带曾有过起义军活动。当地农民说，清兵围剿时，义军就往深山密林撤，还在路上甩下两三双长一尺五寸的草鞋。清兵拾到这特大草鞋，目瞪口呆，疑有神人相助义军，吓得不战自退。我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样的龙门阵多得很，何不下乡去多搜集一些？初冬的山野寒气袭人，冷风卷着毛毛细雨，我跟乡村医生文大伯结伴，踏上去洪江乡的路。大路好走，小路难爬。上山间小路时，我的右手在前面乱抓，抓住茅草、树枝什么的就奋力上攀，手被刺划出道道血痕，也不觉得疼痛。下山时，我干脆就坐在地上朝下滑，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稀泥，连头发上也是一团团泥巴。累了坐在路旁的石头上，偶而传来几声人们的叫喊，悠长又凄凉，更显得山野空旷荒寂。我从口袋里拿出向阳花牌香烟，狠命吸上一口，心里几多凄苦。“爸爸、妈妈，我想你们，家里好温暖哟。”但转念一想，我是为写长诗才来受这苦的，情绪便顿时安稳，甩掉烟蒂又上了路。

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走访了众多农民。有位老农是太平军的后裔，他告诉我，他爷爷是安徽人，曾随翼王征战到黔北后染病不起，从此在洪江落地生根。老农拿出一把存了百余年的铜刀。我握刀在手，听屋外阵阵林涛声，仿佛看见了太平军旌旗万杆，杀声震天的壮丽场面，一个个威武的天国将士横刀勒马挺立山头……热血撞击我的心房，长诗的